

执中鉴西的经世致用与近代社会转型

苏中立， 苏晖

中华书局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之”形轨迹:衰世与经世	1
一 经世思潮:曲折发展	1
二 天崩地解:明道救世	4
三 百年盛世:考据朴学	21
四 内忧外患:经世匡时	25
第二章 史学经世:鉴往与资治	50
一 传统:以史为鉴 以史资治	50
二 初潮:史书之作 鉴往训今	52
三 崛起:雪中国耻 重边海防	58
四 拓展:观摩取法 鉴别去取	71
第三章 经世文编:求实与济时	82
一 明经世文编:备一代之典则 资后世之师法	82
二 清经世文编:经世以表全编 学术乃其纲领	95
三 续经世文编:本爱国之热诚 抒救时之良策	123

第四章	新旧学间:过渡与桥梁	134
一	过渡时代:新旧嬗变	134
二	西学东渐:经世需要	135
三	西学再入:师夷制夷	139
四	文化模式:中体西用	147
五	中介桥梁:突破传统	173
六	旧瓶新酒:新学初创	179
第五章	经世伸展:三世与大同	194
一	三世进化:转变与运用	194
二	太平大同:演变与嫁接	212
第六章	经世延续:表征与特点	226
一	传统形式:经史与文编	226
二	时代气息:主潮与多元	236
第七章	现代转换:遗存与弘扬	245
一	入世精神:究心现实 研治当代	245
二	爱国精神:忧国忧民 振兴中华	256
三	求实精神:不畏强暴 秉笔直书	273
四	开放精神:开拓进取 吸纳新思	288
五	革新精神:兴利除弊 关注国民	294
附录一:	关于经世思想的部分著作目录	298
附录二:	关于经世思想的部分论文目录	301
后记		307

前言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走出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变,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说,这种转变可以追溯到明清之际。在这由旧到新的转变过渡时期,充满着旧学与新学的冲突和嬗变,而由旧学走向新学,即由固有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转变为在会通中西之学的基础上创造的近代新学,其中介和桥梁则是经世致用。

何谓经世致用?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学术思想的方法和学风,有的说是一种崇实学风和价值取向,有的说是一种古老的学术传统,有的说是一种价值观、人生观、事业观,有的说是入世价值取向和治体或治道以及治术等等。实际上,经世致用是指面对现实,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运用古今中外之学为当前现实服务,力求实事求是的一种人文精神和

学风。它具有时间上的当代性、内容上的实用性、学术上的综合性、致用上的广泛性等特点。

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古代形成的,初与天文相对而言。《周易·贲卦·彖辞》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文即指自然,特别是观察天象的变化,以指导农业生产。又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即指文明,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变化,为天下创造人文文化。人文与天文是紧密联系的,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并不断延伸,经世致用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经世致用,不仅可以完整地理解中华人文精神,而且可以使其发扬光大。

经世致用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却在明清两朝,并且经历了一个“之”字形即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它在明末清初兴起,在清乾隆、嘉庆时沉寂,又在清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复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和复兴,表现在诸多领域,主要是经学的经世致用、史学的经世致用和经世文编之风。经世致用在传统旧学与近代新学之间起着中介和桥梁作用,并成为人们追求和实现近代化的内在动力。这是由经世致用的内涵与特点以及中国处在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社会转型这一根本条件所决定的。由于经世致用的需要,不断吸收和扩大西方的近代文化,形成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从而出现了旧瓶装新酒的中国早期新学。

20世纪初,经世致用思想仍在延续。之后,逐渐低落下去,但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却继续遗存,并得以弘扬。它的入世精神、爱国精神、求实精神、开放精神和革新精神,转换成近代的人文精神,使其具有时代特色,保持其青春活力,成为我们今天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动力。

第一章

“之”形轨迹：衰世与经世

一 经世思潮：曲折发展

“经世”一词，首见于道家《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根据该书注疏的解释，经世是“典谟”、“典诰”、规则的意思。《后汉书·西羌传》中说：有人“计日用之权宜，妄经世之远略”。此处的“经世”，则有“经世致用”一词中的经世之含义，指出经世者不仅要考虑眼前的“权宜”之计，而且要有深远的谋略。祁隽藻在 1859 年为“有心经世者”张穆的《蒙古游牧记》所写的《序言》中说：“陈古文之书则贵乎实事求是，论今事之书则贵乎经世致用，二者不可得兼，而张子石州《蒙古游牧记》独能兼之。”“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

之益”。这里将“经世”与“经世致用”并提，二者是指论今事之书，是就政治方面而言的^①。梁启超曾在一些论著中反复谈及经世和经世致用。他说：“所谓‘经世致用’之一学派，其根本观念，传自孔孟，历代多倡导之，而清代之启蒙派晚出派，益扩张其范围。”^②他既概述了经世致用观念之沿革，又说明了它的内涵在不断扩大。事实正是这样。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是最早提倡经世致用的学者之一。他在世时，既将经世思想注入儒家经典，又周游列国，企望说服列国之公卿士大夫等上层人士按照《周礼》的模式去经世、救世。战国中期的孟子，表示要继承孔子、周公和大禹三位圣人的经世之业。《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记载：“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虽为道家《庄子·天下》篇中所最先提出，但它更适合表达儒家的经世思想。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所作《礼记》一书中的《大学》篇，提出了三个纲要、八个条目，就是宣传“内圣外王”的思想。三个纲要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内圣的功夫，即把人们自己内在的明德阐发出来；“亲民”则是外王的事业，即将明德推己及人，达到新民的目的；“止于至善”是说达到至善为止，也就是理想的最终实现与完成。八个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五项

① 祁隽藻：《序言》，张穆：《蒙古游牧记》，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2页。参见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下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8）专集之34，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79页。

属内，是教育人们做内圣的功夫；后三项属外，是推己及人，成就外王的事业。内圣外王、三纲八目，可以说是历代儒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其终极目标在外王经世^①。

古代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从西周开始，官学中开创了“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办学传统；春秋中后期兴起的私学，也是“学而优则仕”，为社会培养参政的人才，即使是不能参政的平民百姓，也要学习政务的管理，心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以天下为己任，目的都是为了天下。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避世情况^②。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儒家主张经世，诸子百家也都主张经世。墨家学派的创始者墨子在《墨子》一书的《尚贤》和《兼爱》篇中把尚贤、兼爱与政事、治乱、贫富联系起来说：“尚贤”为“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兼爱”为“天下之治道”，“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道家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愿过问政事，实际不然，在《庄子·天下》篇中，不仅主张明发“内圣外王之道”，而且力图“周行天下，上说下教”，“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以达到“救民”、“救世”之目的。

经世致用思想虽然在上古时期就产生了，而且一直延续不断，但形成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却是在明、清两朝，并且出现了“之”字形

① 参见景海峰编：《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2 页。

② 参见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20—124 页。

的历程：它在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兴起，清朝乾隆、嘉庆时期沉寂，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开始复兴。这一点，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讲得很明白。他说：明清之际，“‘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乾嘉时期，考据学兴，“清初‘经世致用’之一学派所以中绝”；嘉道以还尤其是鸦片战后，“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①。兴起、沉寂、复兴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正反映了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符合波浪式前进的一般规律。

二 天崩地解：明道救世

1 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形势

明清之际的一代学者，“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②。为什么呢？

（1）社会矛盾的激化

明末清初，正值 17 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汉族广大人民与满族贵族之间的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异常尖锐的时代，用黄宗羲的话说是“天崩地解”^③的时期，是社会激剧变化的时期，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发展。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8）专集之 34，第 21、51、52 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10）专集之 75，第 9 页。

③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南雷文定》（前集后集三集）（一）《前集》卷 1，《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排印发行，第 16 页。

明朝自中叶以后,社会危机开始出现并日益严重。君主昏庸,宦官专权,政治黑暗。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疯狂地进行搜括,土地的高度集中,沉重的赋税徭役,把广大农民推进苦难的深渊。加之晚明时期,水旱蝗灾连年不断,造成赤地千里、民以土石为食甚至人相食的悲惨局面,广大农民在天灾人祸、无法生存的条件下,被迫举行起义。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山东徐鸿儒发动白莲教起义,从天启六年(1626)起,陕北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从西安出发,到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抵达北京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李自成建立了大顺政权。与此同时,蒙古族鞑靼也对内地不断骚扰,女真族后金更是发动了长期的大规模的反明战争,特别是在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之后,满族贵族统治集团乘机率八旗劲旅入关,在明朝投降将领的支持下,于崇祯十七年四月(1644年5月)进入北京,农民起义军经过斗争失败后,退出北京。

清兵入关后,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民起义军余部开始联合明朝军队的余部进行抗清斗争。然而由于南明政权的腐朽等原因,抗清斗争最终失败。经过从清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二十年(1681)间近40年的战争,清王朝终于建立了全国的政治统治。与此同时,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高压政策,这既损害了汉族广大人民的利益,也伤害了汉族士大夫的民族感情,使得一些汉族名士也都参加了抗清的武装斗争,斗争虽然失败,却始终不肯投诚清朝,为清朝服务。

正是在这种“天崩地解”的历史条件下,经世致用思潮逐渐兴起。还在明中叶社会危机开始出现的时候,有人就开始揭露当时的社会危机,并深究其原因,提出挽救的方策。明王朝的覆灭以及

随之而来的“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更刺激着明末清初的士大夫们,痛定思痛,以经世致用自命,揭露现实问题,提出改革方案,从而使经世致用思潮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

(2) 不良学风的严重

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孔子学说中本来浑然一体的内圣外王之学开始发生分离。荀况一派重点发挥外王之学,而孟轲一派则重点发挥内圣之学,到宋、元、明时期,程颢、程颐、朱熹的理学和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相继盛行于天下,内圣之学也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明朝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独崇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派理学,将其奉为官方哲学,科举考试依“四书”、“五经”命题,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答题标准,文章格式规定为八股文,从而造成千篇一律,思想僵化,丧失了人们主体意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单一的毫无生气的沉闷现象。一些理学家虽然在专注于修己之学时,其着眼点仍是在经世致用,但其救世风格大大淡化,当它对政治发生影响时,又必然造成恶劣的社会效果。

明朝的败亡与理学末流空谈性理、不注重国计民生事务有着一定的关系。明中叶以后,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派心学应运而生。它是在反对程朱派理学的过程中出现的。他们针对程朱派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提出了“天理即人欲”的新观点,从而促进了程朱派理学的解体,在客观上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但是,他们继承并发展了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导致许多士大夫空谈心性,不务实际,使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最终也走上了穷途末路。

明代理学和心学空疏无用学风的泛滥,使早期儒家学派治学的优良学风及传统逐渐丧失。然而当理学和心学两派走到尽头的

时候,思想必然向注重实际的方向转化。这是事物发展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在明末即从理学和心学内部分化出一批理学和心学的批判者,他们充分意识到两派末流的心性空谈对于危机重重的明末社会犹如一剂毒药,而挽救明末社会危机的,只能是讲求经世致用之学。这种认识在清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明末清初思想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3)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明中叶以后,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当时,商业资本也随着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活跃起来。与此同时,江南一带出现了市民运动。这些都对明末清初兴起的带有新的时代特色的经世致用思潮产生一定的影响。

2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其代表人物和主张

(1) 代表人物

伴随着经世致用思潮在明末清初的兴起,涌现出了一批有识之士,成为经世致用思潮的杰出代表人物。晚明时期,曾任礼部尚书的徐光启、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的王廷相和以高攀龙、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党人以及以陈子龙、陈溥为代表的复社成员,都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经世致用的精彩议论,其代表作就是陈子龙等人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编辑的《皇明经世文编》(今名《明经世文编》,后有专题论述)。晚明经世致用思潮还哺育了一批承上启下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这些人在明末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强劲的经世致用思潮中经受了锻炼,培植了根底,在清初则成为经世致用的旗手。

1) 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

自少年起,“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抄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①。他生活在明清之际,清兵入关时,正 32 岁,清顺治二年(1645)在家乡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北游山东、直隶、河南、山西一带,用朋友们赠送的两骡两马驮负所需的书籍,长途跋涉,一边搜集文献资料,一边进行实地调查和考察,最后定居在陕西的华阴,实有倚靠秦人、利用关中形势以便反清的意图,主要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

顾炎武虽在哲学上不如王夫之精深,在政治上不如黄宗羲激进,但其学术思想的经世致用,却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个。“他说做学问的目的全在经世致用”^②。顾炎武主张经世致用的总的精神是明道救世。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③他明道救世的经世致用思想具体表现在经学经世、史学经世和研究现实等方面。史学经世另有专题论及,研究现实贯穿在他的各种著作之中,这里只略陈他作为清代经学之祖的经学经世方面的情况。

顾炎武研究经学的宗旨是:治经为了明道,明道为了救世。他所说的道是什么呢?他说:“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④综观他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博学于文。这是讲求知、做学问的道理。所谓博学于文,并不是单纯

① 潘耒:《日知录原序》,(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 1994 年版,第 1 页。

② 梁启超:《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饮冰室合集》(5)文集之 41,第 32 页。

③ 顾炎武:《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附《亭林余集》卷 4,山隐居校本,第 28 页。

④ 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 3,第 2 页。

地寻求书本知识,而是要求贯彻到“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上面。所以他研究最多的是国家典制、郡国利病、历史形势、山川险要、民生状况,希望拿这些实学来代替那些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二是行己有耻。这是讲修身、做人的道理。所谓行己有耻是说要用羞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是针对明末士大夫随世浮沉、昏庸无耻的恶习而发的。在顾炎武看来,做人和做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比较,做人更为重要,可以说是做学问的前提。顾炎武本人正是这样,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可谓高尚人格之表率。三是在求知与修身方面都注意崇实致用。他说:“圣人之道……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不谈。”^①四是批判理学的空疏。顾炎武在谈及理学与经学的关系时说:“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②就是说,他反对掺杂了禅学成分的理学,而不反对从“四书”、“五经”中提炼出来的理学,并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口号,这是他“所创学派之新旗帜”,“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之下而获一新生命”^③。他自己一生中所学的理学,就是躬行实践的理学,从而给带禅学成分的理学以冲击,这无疑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他认为陆王心学比魏晋清谈之流祸还严重,“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从而背弃了儒家的经世实学传统,由

① 顾炎武:《答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6补遗,第19页。

②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3,第22页。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8)专集之34,第9页。

此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即宋、明两朝败亡的悲惨局面^①。他把明王朝的败亡归咎于空谈性理，当然是一偏之说，但在当时却代表了一种学术文化反省的趋向，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代表作是《日知录》。他说：“《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②该书“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文，其宗旨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③。其内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分为15类：论经义、论政事、论世风、论礼制、论科举、论艺文、论名义、论古事真妄、论史法、论注书、论杂事、论兵及外国事、论天象术数、论地理、杂考证。黄汝成在为该书所写的《叙言》中，也概述了该书的内容，并说：“先生（顾炎武——引者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举措更张，言尤慨切。”^④其中如强调地方分权，主张均田减租，开矿兴利等，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一样，既有文献资料，也有实地考察所得，二者相互印证，这就使得他的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

顾炎武的治学，既重视经世致用，又注重考据调查，在掌握翔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所以不仅清代主张经世致用的人继承了他的治学精神，就是考据家也部分地接受了他的治学精神，使他成为乾嘉考据学派的不祧之祖，成为清代汉学的开创者。但是，他的治学目的和途径则和乾嘉考据学派专经研究的风

① 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集释》卷7，第240页。

② 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亭林文集》卷3，第12页。

③ 顾炎武：《〈日知录〉初刻自序》，《日知录集释》，第1页。

④ 《日知录集释》，第3页。

尚大不相同,他明体适用、匡时救世,而不屑规于名物考证。所以,张杓在《日知录·跋》中指出,有人把顾炎武归之于汉学或宋儒,都是不对的。实际上,“先生之才,体用兼备”,“即以经学论……皆折中众说,不名一家”,不必于汉学与宋学之间“为先生强分主奴也”^①。至于经世致用与考据学之间,更不能归之于乾嘉考据学派。他的一生,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以经世济民自任,讲求致用之学,当时学者,也实以此许之。”^②

2) 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早年即参加了反对明末阉宦魏忠贤余孽的活动;中年在浙江组织世忠营,进行反清复明的斗争;晚年专门从事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主要著作有《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等。

黄宗羲认为,“儒者之学,经纬天地”^③,即在本质上是经世致用之学,只是在程颢、程颐之后,学者空谈义理,才使儒学失去了其本来面貌。于是他从复兴儒学传统的高度去批判空谈义理的性理之学,主张经世致用,一方面指出,陆王心学“无事乎读书穷理”,程朱理学则“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

① 贺长龄、魏源等编:《清经世文编》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82页。

② 张舜徽:《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26页。

③ 黄宗羲:《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南雷文定》(前集后集三集)(三)《后集》卷3,第1页。

违”^①；一方面提倡经史经世，说“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②。“穷经”、“读史”，是为了避免空虚，足以应务。

黄宗羲力图总结他在实际斗争和读书思考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清康熙二年(1663)写出了划时代的经世之作《明夷待访录》。该书名的意思是说，书中的经世建策记录，在当世无法实现，只有等待未来的圣明之君前来采访。所以有人说，《明夷待访录》“是经世之文”^③，是他“讲求‘经世致用’之学的产物”^④。该书虽只一卷，但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心是政治思想，以原君、原臣、原法诸篇为纲领，其他各篇依次为置相、学校、取士、建都、方镇、田制、兵制、财计、胥吏、阉宦，其主要之点是继承儒家民本思想，反对封建君主专制，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继承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古已有之，成书于战国初年的《左传》，从民与神的角度，提出民为神之主的命题，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重点在摆脱神对民的控制与压抑。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孟子》，承接和发挥了孔子和《左传》的思想，从民与君的角度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新命题，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重点在摆脱君对民的钳制与压榨。黄宗羲成书于明清之际的《明夷待访录》，则继承和发展了《左传》中民为神之主和《孟子》中民贵君轻的

①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南雷文定》（前集后集三集）（一）《前集》卷1，第15—16页。

② 《清史稿下·儒林传一·黄宗羲》，《二十五史》（12），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1496页。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④ 张舜徽：《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211页。